

【本刊讯】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四月十五日一期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在东亚、澳大利亚加强活动》，摘要如下：

最近苏联人员在日本的各种活动俯拾皆是。苏联负责日本工作的人员访问日本的人数也在增多，借开发西伯利亚之名，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以及苏联驻日大使馆人员和驻日商务处人员频繁地出入日本各政府机关和宣传机构。

他们的活动不只限于一般的日苏关系的交流。比如调查“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动向，主力战斗机的性能；收集有关中国的资料，情报（特别是联系到开发西伯利亚，苏联认为是与此相对抗的渤海海底油田有关的资料 and 情报），调查日中友好势力的言行等等，涉及一切方面。今年夏季到秋季，苏联科学院创立二百五十周年的时候，将展开令人感到反常的“邀请外交”。邀请的范围也是从社会党社会主义协会，“日本共产党”（修），“台湾独立”集团，直到所谓拥护“中华民国”的势力。为了破坏日中友好，加强对日本的影响，真是不择人物（其实是精选的结果）的做法。

四月十四日《东京新闻》等报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即“受苏联武官的指令，在东京收集日本军需工业方面的情报而进行活动的捷克人到神奈川县自首了”。可以说这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罢了。日本的有关当局说，苏联的这种“不可告人的行动”在日中复交以后颇为显著，苏联驻日大使馆人员和商务处人员中，单纯的外交官和商务官员逐渐减少了，而别有目的的人员则增多了。

一方面，日本当局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把来自苏联各方面的对日威胁，用来进行反共宣传，另一方面军国主

日本《现代亚洲》文章

《苏联在东亚、澳大利亚加强活动》

义势力借口“自卫”而用来扩张军备，再进一步看看苏联包括日本在内最近在东亚和澳大利亚频繁活动的情况。

苏联飞机和美国航空母舰

在日本近海相对峙

“防卫厅”根据“航空自卫队”的确认透露，从三月底到四月初，美国航空母舰“中途岛号”似乎是配合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岛根县海面和南朝鲜浦项海面中间进行了登陆作战的演习，对此，苏联飞机四月二日有十二架次，三日有二十架次，四日有五架次飞到美国航空母舰上空，而且接近离岛根县沿岸约三十公里的地方。苏联飞机是设在滨海边疆区基地的海军飞机。对此，“自卫队”从新田原，筑城，那霸紧急出动五十四架飞机来追赶这些飞机。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日本近海的这种军事对峙说明这个地区已成了双方争霸的有力地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也利用这种“紧张局势”，展开了紧急出动等演习。

苏联“渔船”南下到土佐海面

三月二十六日“防卫厅”长官山山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我国渔民因苏联“渔船”而遭受损害的情况。其中透露了苏联“渔船”已南下到土佐海面。

外务省就此事于四月三日根据水产厅整理的资料，通过苏联驻东京大使馆，递交了《关于我国渔船因苏联渔船

而遭受损害的赔偿要求一览表》，同时“要求苏联政府妥善处理”受害者的赔偿要求。

苏联利用三井物产公司

向南朝鲜出口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韩国尼龙公司”透露，这家公司曾于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两次进口了苏联制的已丙酰胺（尼龙的原料）五百五十吨。

这是代理朴“政权”商工部进口业务的“汉城银行”得到商工部同意，于二月二十六日批准进口的。进口批准证上明确记载原产地是苏联。

朴“政权”批准进口苏联制品，这是第一次，而且媒介是苏联接近南朝鲜进行工作的中心地东京，可以说这是个有意思的事实。三井物产公司是在开发西伯利亚方面跑在最前面的贸易公司。

苏联采取加紧接近印度尼西亚

和澳大利亚的政策

苏联自今年以来积极推进接近日本的政策。但最近则千方百计地加紧接近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

这一动向表明苏联企图从南到北地向日本的千岛群岛—日本本土—南朝鲜—台湾省—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的东端，行使影响力。

下面再进一步看看苏联最近在这一

地区的带有某些特征的活动。

菲律宾：一九七三年九月，苏联石油勘探代表团和促进贸易代表团访问了该国。

泰国：据一九七四年一月底的《曼谷邮报》报道，苏联驻曼谷大使馆的二秘访问了各个大学，同学生进行了会谈，提出要为泰国学生支付奖学金。关于奖学金的问题，遭到了泰国政府的拒绝。

国防部长他威说：“苏联外交官频繁地访问泰国南部。”

一九七四年二月，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的亚洲部部长奥夫切尼科夫访问了曼谷，在同当地的报社对谈时谴责了中国。

其后，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访问了曼谷。

印度尼西亚：一九七四年三月初，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访问了雅加达。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外贸部长格里申访问了雅加达，历时五天。

澳大利亚：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苏联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到达悉尼。四月三日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进行了会谈。

据法新社四月十日电说，对于苏联提出的要用澳大利亚在西澳大利亚内联合建设宇宙观察基地的建议，澳外长威尔西说：“政府充分地研究了这一建议，最后决定不能同意。”

如上所述，苏联最近按照这条从日本千岛群岛到澳大利亚的从南到北的线，图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加强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资本大大伸进西伯利亚，甚至被拉进西西伯利亚的秋明，这里隐藏着刚才所说的苏联企图在东亚建立霸权的动向，起到加速苏联打进亚洲的危险作用。

辛格目前的中东和平使命有直接关系。

一些外交官暗示，苏联部长将要求叙利亚人让步，而基辛格在以色列将做同样的事情。

叙利亚人士试图尽可能说明葛罗米柯的使命，说苏联人对有关叙利亚和美国的的关系在改善的迹象感到不安。

这些人士说，苏联部长想查明大马士革政权没有走到象埃及走的那么远。

葛罗米柯抵大马士革同阿萨德会谈

【塔斯社大马士革五月五日电】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今天应叙利亚政府邀请到达大马士革。

葛罗米柯说：“进行这次访问是由于需要就叙利亚和苏联都关心的重要问题继续进行协商。

“我们交换看法的中心问题自然是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叙利亚—以色列前线的部队脱离接触问题。大家都知道，苏联对中东问题解决办法的立场的中心内容是以色列部队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协商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路透社大马士革五月五日电】据官方宣布，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和阿萨德总统今天就中东事态发展举行了五小时的会谈。

一项简短的官方声明说，葛罗米柯和阿萨德总统明天将再次会谈。

它说，今天的会谈集中讨论了以色列全部撤出被占阿拉伯土地的必要性，完全承认巴勒斯坦

人民的权利以及苏叙关系。

【合众国际社大马士革五月五日电】葛罗米柯在抵达这里时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他到这里来主要是讨论戈兰高地部队分开的问题。

他又说：“没有必要重申苏联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中的重要因素是，结束

基辛格到安曼同约旦国王侯赛因会谈

【中东社开罗五月五日电】约旦国王侯赛因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今晚在安曼举行正式会谈。

陪同基辛格的美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谈。约旦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侯赛因国王的私人代表穆罕默德亲王，首相兼外交大臣里法伊，约旦军队参谋长沙克尔。安曼电台说，在这次会谈中研究了该地区的形势，基辛格将他迄今为达成一个叙以战线军队脱离接触协议所作的努力的结果告诉了侯赛因国王，还

讨论了约美双边关系。

【路透社安曼五月五日电】后来一项正式声明说，基辛格向侯赛因国王简要谈了谈他同叙利亚人的会谈进展情况并讨论了有关的问题。

声明还说，在会谈中还讨论了在约旦战线达成协议的问题。

据认为，基辛格的访问对一项全面解决办法，尤其是关于西岸前途具有特别重要性。

预料，在阿拉伯世界广泛猜测他正在为在那里

建立某种巴勒斯坦国奠定基础而努力后，将向他提出一些有关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想法的探索性问题。

【美联社安曼五月五日电】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今天同约旦国王侯赛因和他的高级助手就以色列在西岸一带后撤，和加紧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的前景举行了三小时会谈。

基辛格对侯赛因说，他将继续向他通报他为以色列和叙利亚部队分离所做的努力。

西德总理勃兰特辞职

【德新社波恩五月七日电】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写信给联邦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联邦总统先生：我对关于纪尧姆间谍案件的过失承担政治责任，并宣布辞去联邦总理的职务。我同时请求能使辞职立即生效，并委托我的副手，联邦部长谢尔履行联邦总理的事务，直到选出我的继任人时为止。顺致敬意

维利·勃兰特

【美联社波恩五月七日电】勃兰特总理昨天傍晚宣布由于涉及共产党东德间谍事件的丑闻而辞去西德总理的职务。

勃兰特采取了一个出人意外的戏剧性行动，他在提出辞呈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对即将下台的联邦总统海涅曼说，他由于他在一名亲密助手纪尧姆的间谍作用方面的“失职”而承担责任。

总统的一位发言人说，海涅曼在到汉堡视察期间收到了勃兰特的信，他宣布接受勃兰特的辞呈。

勃兰特党的可靠人士今天清晨说，联合政府中的各党的一个联合委员会本周将准备一个新的政府纲领，并讨论内阁的改组和未来的总理人选。

这些人士说，两党将要求联邦议院议长伦格尔规定在五月十七日选举勃兰特的继承人，这个继承人然后将组成新的社会党—自由党联合政府。这种选举将在特别选举会议在波恩开会选出即将下台的海涅曼总统的继承人的翌日进行。海涅曼是因为年迈而去职的。

在目前情况下，谢尔是否仍然决定退出内阁，从而差不多肯定会当选总统，现在还不清楚。人们认为五十五岁的强健的财长施密特——勃兰特领导的民主党的副主席——可能是这个党的总理候选人。

法政界对第一轮选举结果的反应

关于通货膨胀，政府仍然希望最糟糕的情况到夏天将会过去。现在看来石油价格回降了一些，食品价格由于预料农业好收成而已经在下降。到夏天，如果通货膨胀率真的回降，利率也将下降，政府将有多得多的活动余地来处理失业率，因为到那时失业率很可能上升。

印政府继续逮捕铁路工会干部

印电力工会号召举行示威声援铁路工人斗争

【路透社新德里五月四日电】印度政府现在已拘捕了两千多名铁路工会干部，这是为了迫使工会取消预定于五月八日开始的全国性铁路罢工。

昨天，当很多行业的一百多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这次大逮捕时，印度全国各地的铁路交通都陷于中断。

铁道部长米什拉昨晚扬言，如果这个国营企业的雇员不服从政府的要它为了国家利益而取消罢工的要求，政府就将大量地解雇他们。

最新消息说，仅在共产党执政的南部的喀拉拉邦，自昨天以来就已有一千多人被捕，警方说，在孟买已拘留了五百多人。

有成千上万的旅客呆在火车站里走不了，航空公司的很多班机也推迟了。

观察家们说，从昨天对大逮捕的反应来看有一点是明显的：下星期三几乎肯定，要举行全国性的罢工，这将会造成交通瘫痪。

【德新社新德里五月四日电】印度铁路职工会领导人乔治·费尔南德斯今天从监牢里向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发出呼吁，要求她亲自干预以“体面解决”铁路职工的“正当要求”。

费尔南德斯在他给甘地夫人的信中强调，铁路工人只是在政府甚至拒绝考虑铁路职工的要求之后才决定在五月八日举行罢工的。

据报道，印度许多地方的局势紧张，为了防止出事，由警察在主要铁路上护送火车。

【路透社新德里五月五日电】印度电力工会领导人今天号召举行有力的示威，以支持扬言要在五月八日举行全国性罢工的铁路雇员。

全印电力雇员联合会在马德拉斯发表声明，批评政府逮捕铁路工会领导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声明说这表明了政府对其他工人的想法，联合会号召电力工人把五月十日作为对铁路员工的声援日。

国营铁路局声称铁路交通已全面好转。在五月二日逮捕铁路工会领导人以后，铁路交通因自发性的罢工而受到了影响。

但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要举行任何谈判来避免星期三的罢工，这种罢工可能对已经摇摇欲坠的经济起瘫痪作用。如果罢工举行起来的话，粮食的分配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对发电站的煤炭供应也将陷于停顿。

全国铁路员工斗争协调委员会今天宣布，如果他们的领导人获释的话，它愿意就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的问题举行会谈。

然而，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还没有答复全印铁路员工联合会主席乔治·费尔南德斯先生要求干预的呼吁。

已有五个反对党指责政府进行逮捕是出于政治动机，并要求立即释放那些领导人。

这些政党内有一个是亲莫斯科的印度共产党。这个党在过去三年通常是支持甘地夫人的国大党的。

德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发生冲突

【路透社新德里五月五日电】警方说，在印度教徒同穆斯林教徒之间今天在旧德里发生的一场冲突中有五人被打死，四十二人受伤。

警察为了驱散在一些商店抢劫和放火的人群而开了枪。

这个地区实行了到天九时为止的宵禁。军队奉命进入戒备状态，以防再出乱子。

据警方说，这次骚乱是从站在一座清真寺附近的一个路边货摊前的两个人吵架开始的。警方说，子弹是从清真寺里射出来的。

在这次骚乱开始以后八小时，这两个教族的人

仍继续在流血的战斗。

在一排排商店被放火点燃，暴徒们在古怪的，东倒西歪的楼房间狭窄的小巷里用石块，铁棍，刀子和砖块打架时，这座古城中心的萨达尔—巴扎尔警察局里一直没断过狂呼求救的电话。

记者们看着两个教族的人互相追打时没有几个警察在场，但是一位高级官员说，暴乱开始蔓延时有将近一千名准军事性的边界保安队被调进这个地区。

到晚上八，九点钟时这一整个地区烟雾弥漫，还能听到一些地方的枪声。

法新社说印度和苏联的关系将冷下去

印《金融快报》刊载苏经济参赞谈话《比莱钢铁厂：苏联方面没有拖延》

【法新社新德里五月二日电】印度和苏联的关系继续冷淡下去，正象英迪拉·甘地夫人的国大党和印度共产党的关系那样。

可以归咎于几个因素，印度政府和苏联政府已经在公开争论哪一方应当对苏联援建的印度两个最大的冶金综合工厂——设在比莱和波卡罗——的扩建一再延误负责。

同时，苏联国家银行刚刚确定了卢布对卢比的新汇率率。从五月一日起，一百卢比可以买九·五卢布，而以前的汇率率是一一·二九卢布。

苏驻印度的商务参赞戈尔多波洛夫责备印度人使这些钢厂的生产和扩建延误，呼吁他们拿出“爱国热情”来增加生产。

比莱钢厂的生产本应从目前每年二百五十万吨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四百万吨，但是现在这个目标要到一九七八年才能达到。

在波卡罗，现在预料，一九七七年的生产水平将达四百万吨，而不是原定的七百万吨。

印度官员们反驳说，除了以卢布资助的计划所规定的成本高之外，苏联得对迟迟未运交新式设备和提供生产计划需要的资料负责。

一些报纸社论作者甚至提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技术方面差距给印度造成损害。

这里的观察家们注意到，正当新德里和华盛顿

现在实行和解的时候，苏印之间发生了冲突，而印度共产党采取了新的强硬立场。

预料，和解将以美国恢复对印度的援助——考虑提供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的方式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印度表现出来。

【本刊讯】印度《金融快报》五月一日刊登该报记者四月三十日自新德里发出的一条消息，题为《比莱钢铁厂：苏联方面没有拖延》，摘要如下：

苏联大使馆经济参赞戈尔多波洛夫今天对钢铁部透露出来的下述消息反

印《政治家报》主编评达乌德的内外政策

【本刊讯】印度《政治家报》五月一日刊登该报主编库尔迪普·纳亚尔写的一则报道，摘要如下：

在阿富汗，从未对印度愿意提供的援助表示过冷淡。

达乌德总统希望印度人参与几乎每项工程项目。自去年七月政变以来，人们有一种印象，认为他是在苏联的支持下掌权的。他想用印度专家代替苏联专家（目前有三，四千人）的办法来使这种宣传进行不下去。

在阿富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并不吸引人民的国家里，任何领导人（更不用说尚未完全控制局面的达乌德了）都不能够忽视这一方面。因此，他已采取一些措施以证明他没有

应强烈，即：由于苏联方面的拖延，使比莱钢铁厂在两年后扩大到四百万吨的阶段推迟了。

戈尔多波洛夫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争辩说，苏联帮助扩建的组织原来是遵照了早先规定的到一九七六年完成的时间表的，但是在印度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可能影响到改变原来的目标。他又说：“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正在考虑把完成这一阶段的时间推迟到一九七八年的问题。”

据这位参赞说，到一九七六年底之前，印度的一些企业要为扩建比莱钢

偏向苏联。

另一方面，他同美国签订了涉及四千万美元援助的三项协定，西德的一个贸易代表团预料不久将到达喀布尔，达乌德的兄弟纳伊姆不久将去伊朗访问，讨论贸易和其他问题。这一政策并不意味着达乌德已放弃他称之为中间偏左的纲领。

达乌德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方面仍需要走很长的路。如果他不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他便会开始遇到问题。

除此而外，达乌德在一年内是不能接近于实现建立巴克同尼斯坦这一目标的，他不大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在这方面取得进展。鉴于次大陆出现了新

铁厂准备的设备太多了，这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而且，将要求冶金和工程顾问着手进行“相当大量的”设计工作。“要在现在所剩下的短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大量的设计工作是不现实的。我们还认为，按照原来的时间表完成建立设备的计划也是不现实的”。

这位苏联参赞在回答关于波卡罗钢铁厂是否可能推迟开工的问题时表示相信，到一九七七年三月将完成达到四百万吨的阶段。

当记者具体问到印度政府是否有点不愿意使扩建波卡罗钢铁厂的计划进行下去时，戈尔多波洛夫回答说，他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深深感到，对于建造这一工厂，“有些人不愿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

的气氛，主要为了使巴基斯坦为难而一度曾对这一要求表示出兴趣的印度现在再也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了。

阿富汗是无法单枪匹马去对付巴基斯坦的。实际情况是，达乌德担心伊斯兰堡制造麻烦。

这就是达乌德最近邀请印度和苏联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的一个原因。

但是，最终决定达乌德命运的并不是巴克同尼斯坦问题。决定其命运的将是他在国内的表现。

只有当人们相信达乌德也已使他们失望时才会发生某种事态，也许会发生得更早些，如苏联及其支持者感到他过分倾向于美国的话。

行改组，以包括国家警察部队——现在还没有成立这支部队。

当他一九七二年九月在这里实行军事管制时，武装部队有六万人。在马科斯实行军事管制前的财政年度军事预算是一亿两千万美元；去年六月军事预算是三亿美元。

自从一九四六年独立以来，实际上一直只有美国根据美国定值八亿多美元的一项军援计划向菲律宾提供军事装备。

西贡和泰国为捕鱼问题发生争端

泰向西贡表示抗议 西贡表示不放弃其利益

【合众国际社西贡五月四日电】政府发言人今天说，南越政府在暹罗湾捕鱼区同泰国发生的争端中决不放弃它的利益。

他说，“我们希望同泰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的利益或领土主权。”

政府的海军上周追击几艘泰国渔船，并在暹罗湾寿州岛东南十六海里处打死一名泰国水手。

南越在星期五还俘获另一艘有十三名水手的泰

国渔船，并把他们扣留在富国岛的安泰港。

在第二艘渔船被俘几小时后，泰国官员就一名水手死亡一事提出了抗议。眼前还不知道南越政府的反应。

南越声称它在其三海里的领海范围外拥有宽五十海里的捕鱼区。同泰国海员发生的这两次事件发生在距南越海岸十六海里的二十一海里的地方。

【本刊讯】曼谷《星

暹日报》五月三日报道：据外交部高级官员

二日晚透露，有关南越政府对泰渔民采取剧烈措施问题，外长定于三日召见南越驻泰大使以示抗议，并向南越政府致备忘录。

备忘录强调，泰国只承认南越十二英里领海界线，因这是世界所公认的界线，但南越最近自行宣布扩展领海界线多五十英里事，泰国不予承认。故此，希望南越政府对越入此五十英里的领海界线的泰渔民，勿采取剧烈措施。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五月号刊登于净采写的一篇访问记，题为《任峻瑞谈：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摘转如下：

任峻瑞是耶鲁大学数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一九五二年在美国出生。她的父亲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任之恭教授。一九七二年七月，在耶鲁大学完成了三年学业的任峻瑞，随着她父亲组织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访问团去中国，并且获得批准留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她在中国一共住了十八个月，除了在北京大学学习之外，还在工厂与农村各劳动了两个月左右。

任峻瑞是二十多年来第一个到中国大陆留学的美国大学生。她回到美国之后，《华盛顿邮报》曾刊载了一篇她的专访。哈佛大学的燕京学会也请她去作了报告。为了能详细地了解她在中国的经历与观感，笔者最近特地走访了任峻瑞，并与她作了一次长谈。

任峻瑞的中文程度远远超过笔者事先最好的估计。她能听，能读，能写，并且能说一口流利而带北京腔的普通话。十八个月的功夫能够掌握一种困难的语文，更基本上了解了一个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任峻瑞自己说，“我在中国的一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学习目标最明确，学习成绩也最好的一段时间。”读过这一篇谈话记之后，相信读者们是会同意她的这一个自我评价的。

以下的对话是根据当时的录音而写成的。

于：你到底是怎样申请去中国的呢？

任：我是跟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参观团一道去的，他们替我申请的。我是个小孩，反正什么事也不用做，什么意见也没有。

北 大 生 活

于：你在北大怎么住？几个人住一间？

任：我住的是两个人一间。我的同屋是一个到内蒙古插队又回来的学员。

于：你和同屋处得来吗？

任：很好。她其实也是和我差不多，从小是在城里长大的，本来也不会做活，不会做饭。可是到乡下去了几年以后，什么都会了。什么苦也能吃，什么活也能干。

于：你呢？

任：在中国你要想当一个外国人也可以。他们知道从外国来的人原来的生活水平和思想水平不一样，所以什么都给你优待。可是如果你自己愿意，你也可以和中国同学一样。在这一点上学校的领导很好，他们说不能对我们太照顾，应让我们适当地锻炼锻炼。

于：你们是怎么锻炼的呢？

任：也没什么，起初我们还到留学生食堂去吃饭，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改到普通食堂的。

于：平常是不是还有劳动？你参不参加？

任：学校并不要求我们参加，不过我们要求自己要求参加劳动。有挑土，挖地，挖防空洞，挑水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盖图书馆和游泳池。

于：伙食怎么样？

任：一般吃得都不错，也有人比较俭省，吃得就不那么好。

于：学生对食堂的口味常有意见吗？

任：有时候有，就给食堂贴大字报。食堂的大师傅有时候也给学生贴大字报。比如说有人把饭菜剩下，糟蹋了，他们就贴大字报，提醒学生不要忘记工农兵送他们来上大学，不该浪费粮食等等。

于：国内大学生穿得都很朴素。你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多，有没有注意到一般同学对穿是怎么个看法？

任：一般来说，大学生穿的比工人，农民要朴素得多。不过上海同学还是比较讲究一点，他们会把领子这么翻一下，那么弄一下，北京人就赶不上。据说也有流行的颜色，去年是灰的特别流行，前几年比较流行蓝的。不过这都只是风气，你绝对不会因为穿衣服而感到压力，和西方大不相同。

于：除了外国期刊以外，北大图书馆是不是还有许多外国书籍，比如文学著作这一类的？

任：有很多。外国文学著作，比如莎士比亚，狄更斯的作品，外语系的学生都可以借。

在 工 厂 劳 动

于：能不能讲讲你自己下厂的经过？是你自己要求去的吗？

任：是我要求的。因为我觉得在学校里一年，对中国，对社会主义算是有了个初步的认识。虽然中国的大学里也有劳动，平常也有时要下乡，并且学校里他强调是为工农兵服务，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体验工人农民的实际生活是怎么个样子。我们提出下厂下乡参加劳动的要求后，学校领导觉得应该先去工厂，试试看，然后再决定可不可以去农村。所以我们就去了北京第一机床厂。

香 港 《七 十 年 代》 月 刊 报 道

《任峻瑞谈：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

于：你在工厂里都做了些什么？

任：我先后在三个车间做过活。因为我们一方面当然是要体验工人的生活，一方面也是想了解一下工厂的一般管理情况。最先是到工具车间，做钳工，工作比较轻松。这里的好处是有机会和一些有几十年工龄的老师傅谈话，听他们忆苦思甜。第二个车间是铸工车间，和广里的“铁姑娘”班在一起。她们是一个表现很好的先进单位，精神面貌特别好。尽管这个车间的工作非常累，每天都弄得很脏，天天都要洗头洗澡，但是跟铁姑娘们在一起工作非常愉快。她们年纪都很轻，中学毕业不久，活泼极了，体力也特别好。中间休息的时候她们还打球，唱歌，好象一点也不累。第三个车间是装配车间。这儿工作比较忙，也可以说最重要。这个车间的工人年纪都比较大，精神面貌，劳动态度和活力都和那些铁姑娘不一样。我觉得要对中国工人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也得从这些人身上看才行。他们已经不是生气蓬勃的年轻人，经年累月干的总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单调的活儿，但是他们仍然非常有责任感。在世界观上，在对劳动的态度上，西方的工人同他们比就相差得太多了。

于：和铁姑娘们谈过思想问题吗？她们在思想上解决了“干一阵子，还是干一辈子”这个矛盾没有？

任：谈过。其中好几个人已经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决心要学老师傅们，干一辈子工人。但是我想这个思想矛盾在年轻工人之中总是会存在的。在这方面的认识，也可以说是我下厂的收获之一。人要不怕死，轰轰烈烈的一下子死去，还容易。要能长久不怕吃苦，就需要有更高的思想水平才能办到。

教 育 革 命

于：你回到北大还继续参加学习吗？

任：参加。有时候学《人民日报》的社论，有时候学中央传达的文件。后来反复学习十大文件。还有就是有关教育革命的和批林批孔的一些材料。

于：能不能谈谈在北大是怎么搞教育革命的？运动的主要形式是什么？

任：最主要的是贴大字报，开学习会，批判会。其中有一段时间我在农村，没有参加。后来我回来参加了总结大会。这个会上总结了一些揭发材料，批判了学校里存在的一些落后思想。

于：都是些什么样的落后思想？

任：主要的恐怕还是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有一些旧知识分子还是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由教授管理的超出社会控制的地方。他们说外行不应该管内行。有些人否定教育革命以后的新事物。还有些旧知识分子觉得中国经济发展不够快，所以认为不应该注重阶级斗争，应该多训练有先进技术水平的专业人才。他们时常强调现在的学生程度赶不上文革以前的学生。甚至有人有定命论的思想，认为农民是土包子，教不会。

于：这些思想正是海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常提到的。你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你认为这是落后的？

任：我想主要还是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看这些思想。假如你是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你就会同意这些思想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妨碍的。不让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大学就容易变成一个象牙之塔，大学毕业生就容易脱离群众成为精神贵族，他们就不会好好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就建立不起来。不过多数旧知识分子还是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至少也是爱国主义的。他们因为受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束缚，不能立刻热心支持新生事物。有些人对新生事物要求太苛，一上来就要求它完美，不完美就说它比不过旧事物。

于：海外多数知识分子也是爱国的。他们主观上很希望中国快一点建设起来，看到了文革中间教育和科学研究停顿了一阵子，文革之后又好像在应该怎么办上面迟疑不决，所以心中很着急。不知道你回来以后接触到没有？

任：在耶鲁有些从台湾来的同学也跟我提起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的接触还很少，你怎么个看法？

于：我想主要是因为海外多数人受的是西方式教育，思想上比较都倾向西方。同时，他们没有工农兵的感情，又没有功夫，没有条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他们对国内的一些措施，比如教育革命吧，就比较不容易接受。我接触到的许多人都说不管谁，能把中国搞好就行。所以，我想应该问的问题是：不实行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建设中国，把中国搞好？也有许多人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原则我都同意，可是老是搞运动，贴大字报，攻击这个，批判那个，哪里还有时间来建设呢？他们说为什么不能平平

静静地从事建设呢？

任：国内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是这么想的。

于：我想这就要承认所有事物的发展必然都有一个过程。多数人在做科学实验或是工程设计的时候，也是抱这种态度的。他们知道很少会一试就成，总要反复尝试反复改进才行。但是到了社会问题，他们就不免从一个良好的愿望出发，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希望永远过太平日子。我想，既然科学实验，工程设计都需要一个过程，看社会问题，尤其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改变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么一个大问题，就得更承认这中间必然会有一段复杂的过程才行。中国政府天天都在提“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把这两件事并提，而且还把革命放在建设的前头。可是海外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却只愿见到建设，不愿见到或是忽视了革命这两个字。我觉到应该考虑一下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不搞新事物，不搞社会主义革命，还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任：这次教育革命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比较更了解到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还是有先进的与落后的，正确的与错误的思想同时存在。主流当然是先进的，正确的，可是也不能忽视那些落后的，错误的思想。解决这些思想问题，我看群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体 验 农 村 生 活

于：你在农村干了些什么活儿？

任：主要是割水稻。以后拣白薯，摘棉花，也平地，整地，扬粪，脱粒儿，什么都干一点。

于：我不能不佩服你。实在是不容易。

任：起先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我学中文学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话时，就觉得把苦与死放在一块是一个严重的不对称。我想死是一下子的事，死了就知道了，没有那么可怕。就是苦要活着天天受，就比较可怕。后来听人说劳动的时候应该“一不怕脏，二不怕累”，我又觉得脏了大不了洗掉，累可不好受。所以我没有下厂下乡之前，的确很没有把握。后来证明劳动关并不是那么难过。就是再累，睡一觉起来，又不累了。就象脏了可以洗澡一样，还是能够恢复过来。尤其是在农村睡热炕，特别解乏。我觉得难的还是跟农民打成一片，大概是缺少共同感情和共同语言，和一些老大妈谈天，就不容易。

主 要 印 象

于：有些西方人去中国回来之后说中国人太严肃，“尽是工作，没有娱乐”。你有什么看法？

任：中国一般人工作是比较紧张，但是我看也有足够的娱乐。在学校里，有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是属于娱乐的。在工厂里也一样，比如那个铁姑娘班，她们在每天休息的时候就在一起唱歌，她们自己还编了一个快板的节目。其余电影，公园，游园会，戏剧文艺节目演出，体育节目，都可以说很好。在农村，活动比较少一点，但是大家串门子串得特别勤。这里面有一个生活目标的问题。你要是没有一个生活目标，觉得天天都要吃喝玩乐，还要加点刺激才算是娱乐，那你无论花多少时间在娱乐上面，也会觉得不够，觉得人生没意思。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有生活目标，所以他们对工作就抱不同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工人的表现尤其明显。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他们造了机器建设祖国或是运到外国去支援第三世界，那工作本身虽然好象是很单调，又很累，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很快乐，很有意义。

于：最后一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你在中国的一年半，最主要的印象是什么？你对中国的看法与没有去之前有什么不同？

任：这实在是个大问题，很难答。最主要的印象大概可以说是觉得中国实在是一个很好，很有前途的国家。说好，得要是说是主要的是好，大部分好，不是一切都好。我想我去以前和回来以后的最大的不同也可以说是比较了解了应该怎么样看问题，分析问题。我没去以前印象也是好的，但是那是一种很简单很静止的看法，觉得中国既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该是什么都很好，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我比较知道看中国不能那么简单地看。看到好的，也要看到坏的；看到进步的，也要看到落后的。看到中国的前途光明，也要看到困难。但是光这样也还不够，还要分析到底什么是主流？是好的一面，前途光明的一面为主，还是坏的一面，困难的一面为主？在中国偶尔也听到有人抢钱。在农村里偶尔也听说什么地方的地主坏人把干部给杀了。也有些老年人迷信。听说前年旱得很厉害，又有人想拜神求雨这些。如果对好的坏的不加分析，看不出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那你就会觉得中国还是乱糟糟的，就对中国实际情况得不到正确的印象，对中国的光明前途也不敢肯定了。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五月号刊登于净采写的一篇访问记，题为《任峻瑞谈：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摘转如下：

任峻瑞是耶鲁大学数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一九五二年在美国出生。她的父亲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任之恭教授。一九七二年七月，在耶鲁大学完成了三年学业的任峻瑞，随着她父亲组织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访问团去中国，并且获得批准留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她在中国一共住了十八个月，除了在北京大学学习之外，还在工厂与农村各劳动了两个月左右。

任峻瑞是二十多年来第一个到中国大陆留学的美国大学生。她回到美国之后，《华盛顿邮报》曾刊载了一篇她的专访。哈佛大学的燕京学会也请她去作了报告。为了能详细地了解她在中国的经历与观感，笔者最近特地走访了任峻瑞，并与她作了一次长谈。

任峻瑞的中文程度远远超过笔者事先最好的估计。她能听，能读，能写，并且能说一口流利而带北京腔的普通话。十八个月的功夫能够掌握一种困难的语文，更基本上了解了一个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任峻瑞自己说，“我在中国的一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学习目标最明确，学习成绩也最好的一段时间。”读过这一篇谈话记之后，相信读者们是会同意她的这一个自我评价的。

以下的对话是根据当时的录音而写成的。

于：你到底是怎样申请去中国的呢？

任：我是跟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参观团一道去的，他们替我申请的。我是个小孩，反正什么事也不用做，什么意见也没有。

北 大 生 活

于：你在北大怎么住？几个人住一间？

任：我住的是两个人一间。我的同屋是一个到内蒙古插队又回来的学员。

于：你和同屋处得来吗？

任：很好。她其实也是和我差不多，从小是在城里长大的，本来也不会做活，不会做饭。可是到乡下去了几年以后，什么都会了。什么苦也能吃，什么活也能干。

于：你呢？

任：在中国你要想当一个外国人也可以。他们知道从外国来的人原来的生活水平和思想水平不一样，所以什么都给你优待。可是如果你自己愿意，你也可以和中国同学一样。在这一点上学校的领导很好，他们说不能对我们太照顾，应让我们适当地锻炼锻炼。

于：你们是怎么锻炼的呢？

任：也没什么，起初我们还到留学生食堂去吃饭，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改到普通食堂的。

于：平常是不是还有劳动？你参不参加？

任：学校并不要求我们参加，不过我们要求自己要求参加劳动。有挑土，挖地，挖防空洞，挑水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盖图书馆和游泳池。

于：伙食怎么样？

任：一般吃得都不错，也有人比较俭省，吃得就不那么好。

于：学生对食堂的口味常有意见吗？

任：有时候有，就给食堂贴大字报。食堂的大师傅有时候也给学生贴大字报。比如说有人把饭菜剩下，糟蹋了，他们就贴大字报，提醒学生不要忘记工农兵送他们来上大学，不该浪费粮食等等。

于：国内大学生穿得都很朴素。你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多，有没有注意到一般同学对穿是怎么个看法？

任：一般来说，大学生穿的比工人，农民要朴素得多。不过上海同学还是比较讲究一点，他们会把领子这么翻一下，那么弄一下，北京人就赶不上。据说也有流行的颜色，去年是灰的特别流行，前几年比较流行蓝的。不过这都只是风气，你绝对不会因为穿衣服而感到压力，和西方大不相同。

于：除了外国期刊以外，北大图书馆是不是还有许多外国书籍，比如文学著作这一类的？

任：有很多。外国文学著作，比如莎士比亚，狄更斯的作品，外语系的学生都可以借。

在 工 厂 劳 动

于：能不能讲讲你自己下厂的经过？是你自己要求去的吗？

任：是我要求的。因为我觉得在学校里一年，对中国，对社会主义算是有了个初步的认识。虽然中国的大学里也有劳动，平常也有时要下乡，并且学校里他强调是为工农兵服务，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体验工人农民的实际生活是怎么个样子。我们提出下厂下乡参加劳动的要求后，学校领导觉得应该先去工厂，试试看，然后再决定可不可以去农村。所以我们就去了北京第一机床厂。

香 港 《七 十 年 代》 月 刊 报 道

《任峻瑞谈：在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活》

于：你在工厂里都做了些什么？

任：我先后在三个车间做过活。因为我们一方面当然是要体验工人的生活，一方面也是想了解一下工厂的一般管理情况。最先是到工具车间，做钳工，工作比较轻松。这里的好处是有机会和一些有几十年工龄的老师傅谈话，听他们忆苦思甜。第二个车间是铸工车间，和广里的“铁姑娘”班在一起。她们是一个表现很好的先进单位，精神面貌特别好。尽管这个车间的工作非常累，每天都弄得很脏，天天都要洗头洗澡，但是跟铁姑娘们在一起工作非常愉快。她们年纪都很轻，中学毕业不久，活泼极了，体力也特别好。中间休息的时候她们还打球，唱歌，好象一点也不累。第三个车间是装配车间，这儿工作比较忙，也可以说最重要。这个车间的工人年纪都比较大，精神面貌，劳动态度和活力都和那些铁姑娘不一样。我觉得要对中国工人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也得从这些人身上看才行。他们已经不是生气蓬勃的年轻人，经年累月干的总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单调的活儿，但是他们仍然非常有责任感。在世界观上，在对劳动的态度上，西方的工人同他们比就相差得太多了。

于：和铁姑娘们谈过思想问题吗？她们在思想上解决了“干一阵子，还是干一辈子”这个矛盾没有？

任：谈过。其中好几个人已经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决心要学老师傅们，干一辈子工人。但是我想这个思想矛盾在年轻工人之中总是会存在的。在这方面的认识，也可以说是我下厂的收获之一。人要不怕死，轰轰烈烈的一下子死去，还容易。要能长久不怕吃苦，就需要有更高的思想水平才能办到。

教 育 革 命

于：你回到北大还继续参加学习吗？

任：参加。有时候学《人民日报》的社论，有时候学中央传达的文件。后来反复学习十大文件。还有就是有关教育革命的和批林批孔的一些材料。

于：能不能谈谈在北大是怎么搞教育革命的？运动的主要形式是什么？

任：最主要的是贴大字报，开学习会，批判会。其中有一段时间我在农村，没有参加。后来我回来参加了总结大会。这个会上总结了一些揭发材料，批判了学校里存在的一些落后思想。

于：都是些什么样的落后思想？

任：主要的恐怕还是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有一些旧知识分子还是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由教授管理的超出社会控制的地方。他们说外行不应该管内行。有些人否定教育革命以后的新事物。还有些旧知识分子觉得中国经济发展不够快，所以认为不应该注重阶级斗争，应该多训练有先进技术水平的专业人才。他们时常强调现在的学生程度赶不上文革以前的学生。甚至有人有定命论的思想，认为农民是土包子，教不会。

于：这些思想正是海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常提到的。你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你认为这是落后的？

任：我想主要还是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看这些思想。假如你是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你就会同意这些思想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妨碍的。不让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大学就容易变成一个象牙之塔，大学毕业生就容易脱离群众成为精神贵族，他们就不会好好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就建立不起来。不过多数旧知识分子还是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至少也是爱国主义的。他们因为受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束缚，不能立刻热心支持新生事物。有些人对新生事物要求太苛，一上来就要求它完美，不完美就说它比不过旧事物。

于：海外多数知识分子也是爱国的。他们主观上很希望中国快一点建设起来，看到了文革中间教育和科学研究停顿了一阵子，文革之后又好像在应该怎么办上面迟疑不决，所以心中很着急。不知道你回来以后接触到没有？

任：在耶鲁有些从台湾来的同学也跟我提起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的接触还很少，你怎么个看法？

于：我想主要是因为海外多数人受的是西方式教育，思想上比较都倾向西方。同时，他们没有工农兵的感情，又没有功夫，没有条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他们对国内的一些措施，比如教育革命吧，就比较不容易接受。我接触到的许多人都说不管谁，能把中国搞好就行。所以，我想应该问的问题是：不实行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建设中国，把中国搞好？也有许多人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原则我都同意，可是老是搞运动，贴大字报，攻击这个，批判那个，哪里还有时间来建设呢？他们说为什么不能平平

静静地从事建设呢？

任：国内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是这么想的。

于：我想这就要承认所有事物的发展必然都有一个过程。多数人在做科学实验或是工程设计的时候，也是抱这种态度的。他们知道很少会一试就成，总要反复尝试反复改进才行。但是到了社会问题，他们就不免从一个良好的愿望出发，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希望永远过太平日子。我想，既然科学实验，工程设计都需要一个过程，看社会问题，尤其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改变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么一个大问题，就得更承认这中间必然会有一段复杂的过程才行。中国政府天天都在提“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把这两件事并提，而且还把革命放在建设的前头。可是海外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却只愿见到建设，不愿见到或是忽视了革命这两个字。我觉到应该考虑一下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不搞新事物，不搞社会主义革命，还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任：这次教育革命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比较更了解到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还是有先进的与落后的，正确的与错误的思想同时存在。主流当然是先进的，正确的，可是也不能忽视那些落后的，错误的思想。解决这些思想问题，我看群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体 验 农 村 生 活

于：你在农村干了些什么活儿？

任：主要是割水稻。以后拣白薯，摘棉花，也平地，整地，扬粪，脱粒儿，什么都干一点。

于：我不能不佩服你。实在是不容易。

任：起先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我学中文学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话时，就觉得把苦与死放在一块是一个严重的不对称。我想死是一下子的事，死了就知道了，没有那么可怕。就是苦要活着天天受，就比较可怕。后来听人说劳动的时候应该“一不怕脏，二不怕累”，我又觉得脏了大不了洗掉，累可不好受。所以我没有下厂下乡之前，的确很没有把握。后来证明劳动关并不是那么难过。就是再累，睡一觉起来，又不累了。就象脏了可以洗澡一样，还是能够恢复过来。尤其是在农村睡热炕，特别解乏。我觉得难的还是跟农民打成一片，大概是缺少共同感情和共同语言，和一些老大妈谈天，就不容易。

主 要 印 象

于：有些西方人去中国回来之后说中国人太严肃，“尽是工作，没有娱乐”。你有什么看法？

任：中国一般人工作是比较紧张，但是我看也有足够的娱乐。在学校里，有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是属于娱乐的。在工厂里也一样，比如那个铁姑娘班，她们在每天休息的时候就在一起唱歌，她们自己还编了一个快板的节目。其余电影，公园，游园会，戏剧文艺节目演出，体育节目，都可以说很好。在农村，活动比较少一点，但是大家串门子串得特别勤。这里面有一个生活目标的问题。你要是没有一个生活目标，觉得天天都要吃喝玩乐，还要加点刺激才算是娱乐，那你无论花多少时间在娱乐上面，也会觉得不够，觉得人生没意思。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有生活目标，所以他们对工作就抱不同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工人的表现尤其明显。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他们造了机器建设祖国或是运到外国去支援第三世界，那工作本身虽然好象是很单调，又很累，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很快乐，很有意义。

于：最后一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你在中国的一年半，最主要的印象是什么？你对中国的看法与没有去之前有什么不同？

任：这实在是个大问题，很难答。最主要的印象大概可以说是觉得中国实在是一个很好，很有前途的国家。说好，得要是说是主要的是好，大部分好，不是一切都好。我想我去以前和回来以后的最大的不同也可以说是比较了解了应该怎么样看问题，分析问题。我没去以前印象也是好的，但是那是一种很简单很静止的看法，觉得中国既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该是什么都很好，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我比较知道看中国不能那么简单地看。看到好的，也要看到坏的；看到进步的，也要看到落后的。看到中国的前途光明，也要看到困难。但是光这样也还不够，还要分析到底什么是主流？是好的一面，前途光明的一面为主，还是坏的一面，困难的一面为主？在中国偶尔也听到有人抢钱。在农村里偶尔也听说什么地方的地主坏人把干部给杀了。也还有些老年人迷信。听说前年旱得很厉害，又有人想拜神求雨这些。如果对好的坏的不加分析，看不出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那你就会觉得中国还是乱糟糟的，就对中国实际情况得不到正确的印象，对中国的光明前途也不敢肯定了。